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光 主编

浙中王学研究

Zhezhongwangxue
Yanjiu

钱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光 主编

浙中王学研究

Zhezhongwangxue
Yanjiu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中王学研究/钱明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阳明学研究丛书/吴光主编)

ISBN 978-7-300-11275-6

I. 浙…

II. 钱…

III. 王守仁 (1472—1529) - 学术思想 - 研究

IV. B2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832 号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 光 主编

浙中王学研究

钱 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3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7 000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暨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并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出版资助，特致谢忱！

“阳明学研究丛书”总序一

刘述先*

浙江一向是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明代，王阳明提倡心学，挑战流行的官学（朱学），风行一时。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回到故乡，自此广收门徒。据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收徒首先在浙中，然后是江右（指江西，《止修学案》括入）、南中（指江苏，《泰州学案》括入）、楚中、北方、粤闽。浙中人数不多，但钱绪山、王龙溪影响深远。梨洲对江右评价特高，竟谓：“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但江右虽人才众多，却并无统一观点，梨洲特别表扬聂双江、罗念庵，显然别具用心，这里面牵涉到许多问题需要考察。泰州派的问题更大。梨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归根结底，不外蕺山所谓：“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很明显，由蕺山的观点来看，泰州是“参之以情识”，龙溪是“荡之以玄虚”；蕺山之学则乘王学之流弊而起，这便是梨洲写《明儒学案》的背景。至于楚中，梨洲以楚学之盛，

* 刘述先，江西吉安人，1934年生于上海。台湾大学学士、哲学硕士，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东海大学讲师、副教授，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1974—1981），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81—1999），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讲座教授（1999—2004）。现任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等职。著作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黄宗羲心学的定位》、《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等20余种，并有英文论文60余篇及著作多种。

唯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评价不高。王门在北方与粤闽则缺少发展，可以从略。

有了以上的背景，我们乃可以找到一条统一的线索来看吴光教授策划与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其内容包括专著十部，论文集一部。自1981年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国际宋明理学会议以来，浙江就是研究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重镇。^①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这套丛书正是其研究成果的展示。专著十部，首先是董平著《王阳明的生活世界》，从对阳明生平的阐述中，展示阳明生活世界的变化与思想世界的演进。接着钱明著《浙中王学研究》，徐儒宗著《江右王学通论》，吴震著《泰州学派研究》，对王门的三个重要流派作出了深入的省察。然后是何俊、尹晓宁合著的《刘宗周与蕺山学派》，由此可以看到梨洲虽对蕺山之学大行于世抱有很高的期望，结果却事与愿违。到了清初，发生典范的转移，梨洲成为心学的殿军，不期而然促成了“达情遂欲”、“力行实学”、“文献考据”的转向。吴光著《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探讨了梨洲的学术成就，从而肯定了他之作为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然而丛书并不局限于儒家的视域。朱晓鹏著《王阳明与道家道教》，陈永革著《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爬梳了史料，揭示了阳明学与道家道教以及晚明佛教（包括“狂禅”）的关系。同时阳明学又不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还具有现代意义。刘宗贤、蔡德贵合著的《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具体探讨了阳明心学的内在发展——现代新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鼎足而三）的思想特质及其与阳明学的思想联系。丛书还包括了韩国学者崔在穆著《东亚阳明学》的中译本，展示了一个跨国界的开阔视野。最后《阳明学综论》收录了当代多位著

① 自1981年至今，浙江学界举办过多次关于叶适、陈亮、吕祖谦、刘基、王阳明、黄宗羲等宋明理学家以及浙东学派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举办了“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省一级学会“浙江省儒学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研究集刊》和《儒学天地》杂志以及《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继往开来论儒学》等专题论文集，还有多部儒学论著，从而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与肯评。

名阳明学专家所撰稿，并汇集参与本系列研究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论文，编为论文集，希望能在阳明学研究中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2009年6月10日序于台北

“阳明学研究丛书”总序二

吴 光

1984年至1991年间，我有幸担任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负责组织策划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究”，主持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等多种古籍的整理校点工作。本来还计划组织一套“浙学资料汇编”和一套“浙学研究丛书”，但由于某种非学术的原因干扰了这一计划的贯彻落实，致使当时的我在离职感言中发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但到2000年前后，形势变化，我再次被委任为本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继而担任主任。于是，与时任哲学研究所所长董平先生共同策划、分工合作，由他负责主持“阳明后学研究资料丛刊”的课题^①，由我负责主持“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课题。后来，由我主持的课题先后得到浙江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立项成为浙江省2001年度社科规划重大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2002年度规划课题。我们的课题组12名成员经过7年的艰苦努力，最终完成了这套包括9部专著、1部译著、1部论文集，总计11册约300万字的“阳明学研究丛书”。丛书完成后，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支持，提供了出版补贴；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① 本课题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立项成为本院2000年度重大课题并提供出版资助，最终完成了一套由万斌任主编，钱明、董平任副主编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10册），由凤凰出版集团于2007年出版。

予以出版，使著者、编者的辛勤劳动得偿所愿，也可谓学术之幸也。

以往关于阳明学的研究成果，偏重于对王阳明本人及王阳明学说本身的解说，而缺乏对阳明后学各派的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既没有组织集体力量进行系列性的大课题研究，更没有出版过系统梳理和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学术思想的系列丛书。然而，深入研究王阳明与阳明后学各家各派的思想宗旨、学说特色、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深入研究阳明学与道教、佛教以及明清儒学、近现代新儒学、当代儒学、东亚（日本、韩国）阳明学之间的思想联系，深入研究阳明学与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关系诸问题，不仅对于系统整理中国哲学遗产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多元和谐的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们设计本课题的初衷，一是要自觉担负起作为阳明学发源地和发展重镇的浙江学者的历史使命，对阳明学的发展演变作出系统性的思想史的总结，向国内外读者奉献我们系统探索王阳明及其后学各派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与角度揭示阳明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现代意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多元和谐新文化而贡献我们的知识与心力。本丛书的各项具体成果，基本上实现了这一初衷。

本丛书研究的主要思想是：第一，通过对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及其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目标、“知行合一”为方法的学说思想的综合研究和客观评价，力求使当代读者能够全面了解王阳明的学术贡献，正确认识王阳明学说的理论内容、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第二，通过对阳明学内部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的具体研究和比较研究，理清阳明学形成、发展、分化、演变乃至衰落、复兴的历史过程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三，通过对王阳明以后的明清以至当代儒学与阳明学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特点与规律，进而探索阳明学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与现代意义；第四，通过对阳明学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社会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不同命运、不同历史作用的比较研究，探索思想文化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辩证关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建设现代精神文明提供有意义的历史借鉴。

本丛书特色在于，它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各个思想家思想学术的个案分析与阳明学各学派和宋明以来心学思潮研究相结合的系列研究课题。其内容体现在各位课题参与者撰写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本丛书的选题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人物大传，主要是论述阳明学派三大儒（创教者王阳明、修正者刘宗周、转型者黄宗羲）的生平事功与学说思想，附论其所创立的学派（姚江学派、蕺山学派、浙东学派）之概况与特色；二是专题研究，本丛书选择了阳明后学三大派（泰州王学、江右王学、浙中王学）以及王阳明与道家道教、晚明佛教、当代新儒学三专题进行系统化的分析研究；三是比较研究，既有阳明学内部诸学派的比较研究，也有阳明学与明清佛学、道家道教以及东亚（日本、韩国）阳明学的比较研究。通过这些成果，大致展现了王阳明及其后学各派的思想内涵与学派特色，展现了阳明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对中外儒学思想史的重大影响。

我相信，读者从本丛书各部著作与专题论文中，可以看到作者艰辛劳动的收获，可以分享作者闪烁智慧之光的学术成果，还可以获得弥足珍贵的思想启迪。此言虚乎？实乎？还是敬请读者深入丛书内部一探究竟吧！

2009年7月25日识于朝晖力行斋

目 录

第1章 浙中王学形成与发展的人文地理环境	1
第一节 从“浙学”涵义的衍变看王学在浙江的兴盛	2
第二节 “浙学”的东西异质与王学的跨江传播	9
第三节 “浙学”的建构与浙中王学的分疏	27
第2章 浙中王门的盛衰及其成因	53
第一节 王阳明在浙中的讲学活动	53
第二节 浙中王门的兴起与衰微	62
第3章 浙中阳明学者的个性特征	80
第一节 王阳明的早期越中道友 ——王思舆、王琥、许璋论	80
第二节 浙中王门的经学形态 ——黄绾、季本论	89
第三节 浙中王门的实学形态 ——顾应祥、孙应奎论	107
第4章 浙中王门学派的早期型态 ——徐爱论（附蔡宗衮、朱节）	134
第一节 家世、性格与学问	134
第二节 为政、为学与为师	150
第三节 存世之作与文献之误	168
第5章 浙中王门学派的实干家 ——钱德洪的著述与生平	186

第一节 著述失传	186
第二节 现存史料	189
第三节 绪山行实	193
第6章 王学在浙中的展开与挫折	
——钱德洪、王畿合论	215
第一节 钱、王性格之比较	216
第二节 钱、王思想之异同	221
第三节 钱、王关系之不和	245
第7章 王学在浙西的传播与发展	
——董澐论（附董穀）	291
第一节 “从诗而儒”与“自友而师”	292
第二节 “受用白沙”与“自爱庄周”	302
第三节 “此心求空”与“见就是性”	311
第四节 附记：著述与刊本	321
主要参考文献	342
后记	353

浙中王学形成与发展的人文地理环境

浙中王学就其直接的思想脉络而言，不言而喻，当源自于明代的大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艺术家——浙江余姚人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然就其间接的学脉关系来说，则上可推至孔、孟、濂、洛、关、闽、陆，中可溯及宋元以来源远流长的“浙学”之传统。因此，本书拟以“浙学”为开篇，以探寻浙中王学的源头活水。

需要说明的是，“浙学”之所以不能像“闽学”、“皖学”、“吴学”那样直接称为“越学”，乃是由于宋以后以“越”或“越中”特指绍兴已成惯例^[1]，“越”已不能像先秦那样代表当时的浙省之大部。故宋以后通常称浙江为“浙中”^[2]，一如“闽中”指福建、“吴中”指江苏。一般地说，浙江学术思想发展的萌芽期是在秦汉至五代时期，高峰期是在宋元明清时期，而“浙学”的形成与繁荣，就是在被称为“近世”的宋元明清时期。所以笔者试图先从“浙学”的涵义入手，以比较宋元明清时期学术界对“浙学”一词的各种诠释，从而为“浙中王学”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然后再通过对“浙学”之地缘与学缘关系及其历史衍变的考察，而求得对“浙学”诸学脉的大致梳理与分析比较，从而勾勒出王学在浙中发生、发展、演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学术思想基础。这里所谓的“地缘”，是指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沿革及异同；所谓“学缘”，是指各种学说、学派的形成、演变及传承。如果说“学缘”是以“地缘”为物质载体的话，那么“地缘”便是以“学缘”为精神脉络。而把握住了“浙学”的“地缘”与“学缘”及其相互关系，也就能深入解剖产生于明代中叶的浙中王学的形成机制与思想内蕴。

第一节 从“浙学”涵义的衍变看王学在浙江的兴盛

一、“浙学”与“心学”

“浙学”一词最早是朱熹为批评南宋浙东的事功学派而提出的概念。刚提出时，不仅命名者带有明显的贬抑之倾向，而且被命名者即当时的浙江学人，由于很少有立门分户的自觉，使得“浙学”在学脉系统上远不如关、洛、濂、闽及江西诸学派那么精致完备，以至当时及以后的学者们在讲到南宋学术时，很少或根本不提“浙学”。譬如《宋元学案》在述及浙江鄞县学者王应麟时尝评论道：

咸淳元年（1265）七月，除著作郎。时汤文清公为太常少卿，与先生（指应麟）邻墙居，朝夕讲道，言关、洛、濂、闽，江西之异同，永嘉制度、沙随《古易》、蔡氏图书经纬、西蜀史学，通贯精微，剖析幽渺。^[3]

“浙学”在当时不仅影响甚微，而且即使使用“浙学”一词，其涵义也很不确定。南宋以后，“浙学”之称谓大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涵义。狭义者单指南宋浙东的事功之学^[4]，甚至仅指永嘉之学或永康“陈学”^[5]；广义者则将其扩充至宁绍四明诸学派。^[6]不过，无论狭义还是广义，“浙学”一词都仅限于两宋尤其是南宋的浙东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明代以后，围绕着“浙学”的话语环境发生了改变，因而使其涵义亦逐渐呈现出多义性。

明人刘鳞长^[7]在任浙江提学副使时所编的《浙学宗传》（不分卷，明崇祯十一年自刻本），就是为与周汝登所撰的《圣学宗传》相衔接，并对应于其父刘廷焜所纂的《闽学宗传》（不分卷，浙图藏刘

廷焜刻本)而编纂的。在刘鳞长看来,“浙学”乃是与具有朱学传统的闽学拥有共同学术渊源的孔孟圣学之支脉,其学之源头,远者尧、舜、文、周、孔、孟,近者杨时、朱熹、陆九渊,而其鼻祖则是浙西的张九成和浙东的杨简。从《浙学宗传》所辑之人物看,刘鳞长所说的“浙学”概念,正是指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的“心学”之流脉^[8],这点在刘鳞长所撰的《浙学宗传序》中表现得尤为清晰:

于越东莱先生与吾里考亭夫子问道质疑,卒揆于正,教泽所渐,金华四贤,称朱学世嫡焉,往事非邈也。击楫姚江,溯源良知,觉我明道学,于斯为盛,今岂遂绝响乎?缘念以浙之先正,呼浙之后人,即浙学又安可无传?周海门《圣学宗传》尚矣,然颇详古哲,略于今儒。乃不揣固陋,稍稍编汇成书,梓且行。……今夫尧、舜、文、周、孔子、孟氏,万世知觉之先。大宗之祖,闽与越共之,不具论。论溯近宗,则龟山、晦庵、象山三先生。其子韶、慈湖诸君子,先觉之鼻祖欤。阳明宗慈湖,而(按:疑脱“弟”字)子龙溪数辈,灵明耿耿,骨血相贯,丝丝不紊,安可诬也?……然而此点灵明骨血,还注当身,一加濯磨,无难昭灼,反而求之,便登吾宗谱牒,亦于心学加之意而已。圣为学宗,心为圣宗。苟得其传,毋论子韶、慈湖而下,堪称慈父,行且尧、舜、周、孔,同我正觉。……了心入圣,为宗门中大觉,至孝而无难;不明心学,即堕落于罔觉,不孝而不可药救。所贵还返个中,认正宗传,学恒于斯,教恒于斯,则若闽若浙,同属家亲,而大宗小宗,共登上岸矣。^[9]

对此,四库馆臣的评论相当精到,称《浙学宗传》是“采自宋讫明两浙诸儒,录其言行,排纂成帙;大旨以姚江为主,而援新安以入之”^[10]。刘鳞长的目的,就是要打通浙学与闽学,使心学与理学不仅在源头上“同属家亲”,而且在传承中彼此贯通。

然其实，将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视为“浙学”之宗传的理念，早在刘鳞长之前就已萌发。如折中王（阳明）湛（甘泉）的浙西思想家蔡汝楠^[11]说：

吾浙学自得明翁夫子（阳明），可谓炯如日星，然及门同志，海内间有未信，至目为柔耍颓惰，要亦功利习气有一二逗漏处被人觑破尔，取益岭海，掇此金针，知吾伯丈不但自跻至域必有所以发明师训，兴起漏习行自浙中以遍天下者，又何幸何幸！^[12]

吾丰（聂豹）则谓我浙学承阳明夫子之绪，如曹溪以后谈禅，非来本意矣。^[13]

蔡汝楠是湖州德清人，故其所述之“浙学”，特指明代两浙地区的阳明心学，较之刘鳞长的“浙学”概念，“空间”相同（指两浙地区）而“时间”压缩（仅指明代）。

然清初浙东学人全祖望、黄百家所使用的“浙学”概念，相对于刘鳞长，则不仅在时空上作了压缩，仅限于宋代的浙东之学，而且在内涵上也作了转换，特指浙东的事功之学与经史之学。如全祖望说：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尊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14]相应。^[15]

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尝从蓝田吕氏（大临）游，非横渠之再传乎？……予故谓为晦翁未成之书，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16]

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17]

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晦庵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有之，

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18]

可见，全祖望虽认为浙东、浙西之学“皆与安定湖学相应”，但并未形成一个既包括浙东之学又包括浙西之学的“大浙学”概念。因为全氏在后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浙学之盛，实始于”永嘉九先生，后在其著述中，又都围绕着浙东诸学派而展开，说明其心目中的“浙学”仍只限于“浙东之学”。而所谓“皆与安定湖学相应”的意思，则是指两浙之学皆可与宋代理学相衔接，在学脉上具有共同的源头，也根本谈不上某些学者所说的“大浙学”观。后乾嘉时期杭州学人赵一清又受老师全祖望的影响，写了《浙学渊源考》。该书笔者未见，估计是按照全祖望的浙学理念编撰的。

同时，黄百家在《龙川学案案语》中亦认为：

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起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19]

也就是说，在黄百家眼里，所谓“浙学”，也就是南宋浙东地区的功利之学。

应当承认，刘鳞长把整个浙江的心学系统视为承闽中朱学而兴起的“浙学”之宗传，虽含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门户之见，但却很有创见，颇具深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凸现出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更在于首次把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自己的观察视野。事实上，浙西之学虽与浙东之学存有明显差异，但亦不无相当密切的同源、互动关系。至于把心学尤其是阳明学当作“浙学”之宗传的做法，却是在失之偏颇的同时，而无意中揭示出阳明学与宋代以来之“浙学”传统的内在联系。因为如果就心学与史学相融（或称心学化的史学）的“浙学”之根本精神而言^[20]，王阳明及其部分浙中弟子的学术理念可以说是其最好的诠释之一。这其中既有王阳明的“六经皆史”和“道即事、事即道”所代表的心学